

《師大臺灣史學報》
第7期 頁77-112
2014年12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

戰爭與動物： 臺北圓山動物園的社會文化史*

鄭麗榕**

摘要

本文主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臺北圓山動物園的案例，從動物宣傳、動物殺害與動物紀念三個面向，就歷史學的角度，探討戰時與動物相關的宣傳、「猛獸處分」政策以及動物慰靈祭，以呈現戰時動物被國家軍事資源化利用的情形。

戰爭時期動物園被納入軍事動員，作為提升官方所欲形塑的「戰爭道德」（war moral）的場所，成為精神動員工具，動物展覽、愛護與追悼都是愛國活動的展演。宣傳上巧妙地透過動物強化軍人家族情感，將前線和後方都聯結在愛國的目標下。猛獸處分政策則顯示動物的犧牲被國家合理化，在戰時食糧有限、空襲陰影下，此一政策甚至可能成為心理戰的工具。動物慰靈祭則是透過儀式，強調動物對人類的貢獻，戰時著重對軍用動物的追悼，

* 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諸多指正，並提供參考資料增補本文之不足。惟筆者學識所限，疏漏之處難免，尚請讀者不吝賜教。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戰後則轉化為肯定動物帶給人們的歡樂。

在戰爭中，動物的價值被國家重新定義，有助於戰力的動物被珍視、被繁殖，無助於戰爭者則被屠殺處理，對動物的紀念儀式，也是為強化利用的目的而舉行，因此剝削愈多，紀念儀式也舉行愈頻繁。因此可以說，動物也參加了人類的戰事，而人與動物的關係在戰爭時期也被重新改寫與形塑。

關鍵詞：戰爭、臺北圓山動物園、猛獸處分政策、動物慰靈祭

一、前言

戰爭是形塑歷史與社會的重要力量，戰時社會運作有別於平時，在高度軍事動員的背景中，人與動物的關係產生變化，動物所面臨的處境也更嚴峻。本文主要以二次大戰時期臺灣動物園的案例，從動物宣傳、動物殺害與動物紀念三個面向，就歷史學的角度，探討戰時與動物相關的宣傳、「猛獸處分」政策以及動物慰靈祭，以呈現戰時動物被國家軍事資源化利用的情形，試圖反映過去歷史中較少關注的動物身影。

近代動物園的歷史，適足以反映人對動物的認識與態度的變化。多數有關動物園歷史的研究基於動物對人的意義（功能取向）而展開，如Eric Baratay與Elisabeth Hardouin-Fugier以近代西方（指歐美）動物園的發展為重心，探討16世紀到20世紀，人們把收藏熱、控制需要、嚮往大自然等不同的時代特色反映到動物園，藉此重現現代動物園從歐洲的起源及其改變。¹也有從國家的角度來研究動物園者，如Ian Jared Miller以亞洲的日本上野動物園為主，觀察日本在走向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利用動物展示所呈現出國家對自然知識的掌控與宣傳，將動物園研究放在生態現代性構架中。²Nigel Rothfels則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動物商與動物園經營者Carl Hagenbeck著手，闡明動物園的經營受企業家深遠的影響。³徐聖凱則從機構史的角度，從現代化的角度，為臺北動物園百年來的發展，勾劃出「如何從一個地方上的前近代動物園，走向一座國際級的現代化動物園」的圖

1 Eric Baratay & Elisabeth Hardouin-Fugier, *Zoo: A History of Zoological Gardens in the West*,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中譯本：Eric Baratay & Elisabeth Hardouin-Fugier 著、喬江濤譯，《動物園的歷史》（臺中：好讀出版公司），2007。

2 Ian Jared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本文引用之版本為 Kindle 閱讀器上的電子版，頁碼標示以 Loc 註記，謹此說明)

3 Nigel Rothfels, *Savages and Beasts: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Zoo (Animals, History, Culture)*, Baltimore ; London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像。⁴

而有關戰爭時期動物園的著作，多強調戰線中動物園所面臨的問題，如空襲與糧食問題下，動物園的動物如何被搬遷、處分甚至救援（較成功的例子僅見於21世紀時期巴格達動物園）；也有觸及戰爭中，珍貴罕見動物被侵略者掠奪的例子。⁵其中亦呈現戰時動物的特殊處境，事實上，誠如一位動物園經營者所言，由於園內的動物完全依賴人類生活，戰爭時期動物的情況比一般百姓更為淒慘，動物的搬遷也非常不容易。⁶Mayumi Itoh（伊東真弓）即以「沈默的受害者」形容二次大戰中的動物，並據此回顧分析日本戰爭時期的動物處理政策，其觀點也是本文重要的參考。⁷

本文觸及動物觀，從戰爭時期臺灣圓山動物園的例子，談國家對動物的區別態度，「有用的」動物被彰顯，「危險的」動物被屠殺，而後在紀念儀式中定義動物對人類的功能。由於文中所探討相關動物宣傳、殺害及紀念活動的舉辦，都由官方主動，文中的動物觀偏向掌握政治權力者的觀點，而非庶民對動物園的看法。臺灣的圓山動物園創建於1910年代，是延續19世紀至20世紀初以來，歐美各大城市競相設立動物園的風潮，於日本

4 徐聖凱，《臺北市立動物園百年史》（臺北：臺北市立動物園，2014）。

5 戰爭期間的動物園有兩本相關名著：一本是有關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至二次大戰結束，其間華沙動物園的情形，見黛安·阿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園長夫人》（臺北：時報文化，2008）；以及美伊戰爭結束後，2003年巴格達動物園動物緊急救援的情形，見Lawrence Anthony & Graham Spence, *Babylon's Ark: the Incredible Wartime Rescue of the Baghdad Zoo*(NY: St. Martin's Press, 2008)。黛安·阿克曼著作中提到，德國在二次大戰中，有意把華沙動物園中罕見珍貴動物與配種紀錄，都掠奪到德國動物園和保育區裡，以創造一個「重建自然環境光輝」的「新德國帝國」，「一如希特勒想要復興人類種族一樣」，因此德國入侵華沙後，華沙動物園的小象被送往哥尼斯堡，駱駝和美洲駝被運到漢諾瓦，河馬被送到紐倫堡，普氏野馬被送到慕尼黑，山貓、斑馬和野牛則被送往柏林動物園，其他餘下的動物則成為狩獵對象，遭到屠殺取樂，見黛安·阿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園長夫人》，頁84-87。

6 有關戰爭期間動物的處境之語，出自二戰期間華沙動物園園長夫人安東妮娜·扎賓斯基（Antonina Zabinski），見黛安·阿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園長夫人》，頁46。

7 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本文引用之版本為Kindle閱讀器上的電子版，頁碼標示以Loc註記，謹此說明)

殖民時期，由地方官廳在臺北設立，直到1930年代下半，開始受到戰爭的深刻影響。戰爭時期的動物園並沒有因為資源的減少而立即沒落，在社會活動中也沒有被邊緣化。從圖1可知，戰爭時期（尤其是1937-1941年間）臺北市圓山動物園的觀覽人次，大致維持在每年約30萬人次左右，雖不是大幅上升，但可說是處於穩定的趨勢。此中主要原因，除早期民眾對進入戰爭時期的意識尚不高之外，也因為動物園偏重休閒娛樂功能，亦即是市民逃離單調日常生活的「慰安設施」，在壓力中更可能產生休閒需要。⁸圓山動物園及日治時期臺灣的其他小型動物園都設置在都市公園內，與市民關係密切，又是旅遊（尤以家族親子出遊為主）勝地，時人留下動物園的旅遊紀錄，顯現濃郁的庶民休閒生活滋味，而非嚴肅的官方教化氣息。⁹此一需求在戰爭時期被官方充分運用，在維持經常性的營運外，戰爭時期的動物園被有意納入軍事動員，作為提升官方所欲形塑的「戰爭道德」（war moral）的重要場所，動物園與動物都成為精神動員的工具，包括對軍用或國家用動物的展覽、愛護與追悼，而成為愛國活動的展演場。

因此，本文擬以臺灣動物園為例，探討尚未成為前線的戰時動物園被國家動員的情形，以及在戰爭腳步接近時，動物園內的動物如何在臺灣這個區域中，因為市級經營者執行日本帝國決策而對所謂猛獸進行處理的實

8 Ian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Loc795.

9 圓山動物園在旅遊中的重要可從許多私人日記找到例證，由於臺灣神社就在附近，許多遊客都是結束神社行程後就到動物園玩賞。林獻堂、吳新榮、呂赫若、楊基振等人日記都記載過他們到訪動物園，戰爭時期亦不例外，多數都是帶子女，一部分則是與朋友共遊或帶學生前往，其中對養殖動物有興趣的吳新榮，多次強調動物園有益於兒童甚至成人的「動物教育」。長住臺南的吳新榮日記中到訪圓山動物園的紀錄有：1935年11月12日與妻兒同往，1952年8月29日其母與兒孫到動物園，1953年3月9日與朋友及小孩去。林獻堂則於1937年5月30日、1937年9月7日、1943年5月9日與兒孫同訪上野動物園。呂赫若幾次提及圓山動物園：1942年4月10日與朋友去，同年12月6日孩子與大人去，1943年3月14日復帶4個孩子到訪，同年6月8日在動物園前遇到學生，同年11月12日再帶孩子前往。張麗俊1924年11月5日北上，到圓山先訪神社，後到動物園「觀珍禽奇獸」；1935年4月9日到大阪時曾赴動物園遊玩。楊基振1947年6月1日記載女友帶楊3名子女到圓山動物園玩。以上各資料均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況，最後再分析官方如何利用動物慰靈祭等活動作為教化工具。因為戰爭結束前臺北圓山動物園的檔案多已不存，相關記載較為零碎，文中所舉實例，主要參考《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以及少部分私人日記與回憶。然亦由於資料所限，關於庶民對於官方這些具教化意涵的作為有何反應，很遺憾筆者掌握有限，尚待發掘更多資料以究明真相。

1920-1941年台北動物園觀覽人次曲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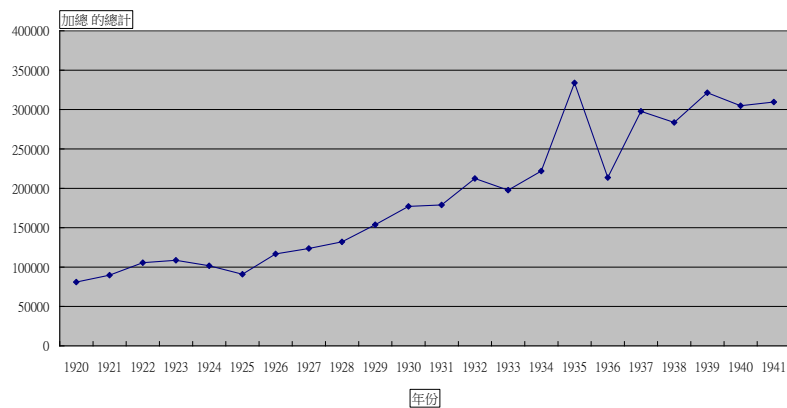


圖1 1920-1941年臺北動物園觀覽人次曲線圖

資料來源：依《臺北市統計書》之數據，筆者繪製而成。

二、戰時動物的軍事資源化

動物被運用在軍事上自古有之，馬、駱駝、驢、象等動物尤其是亞洲常見的例子，但是運用動物園來宣傳這些動物的價值，應是20世紀1930年代之後的事，這與一次大戰後戰爭的擴大動員，動物更被軍事資源化有相當的關係。¹⁰ 二次大戰時一切社會與經濟資源都被納入戰爭，不僅運用機

10 以下舉一個例子，或可推想二次大戰後動物可能成為戰力資源的一個側面例子。為減輕戰爭中空襲的壓力，上海英國報紙曾以戲謔的方式，建議中國陪都重慶動員動物，包括狗、鴿子、貓及鼠等，以對抗日軍的空襲。〈動物を總動員して 防空の完璧を期す 上海の英字紙が重慶を揶揄〉，《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6月2日，版7。

械，也不放過所有的生物資源，甚至連微生細菌也不例外。¹¹ 據估計，第一次世界大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運用動物參戰的數目，從1,400萬增加至兩倍，而前者戰後被授予勳章的動物則有18萬；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裡大量的使用了鴿子、狗、馬、驢、水牛與象，其中象發揮最多功能，協助築路、建機場及造橋，也被利用在輸送大砲等武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在戰爭時期進行關於動物的行政組織調整，以運用動物於運輸、通訊、騎兵部隊等。¹²

日本帝國在戰爭時期對動物的運用，以軍馬、軍犬及軍鴿為主，這三種動物的銅像也列在其靖國神社以示紀念。其中軍馬的部分，自1904年日俄戰爭起，日本即啟動30年馬政計畫，宣揚愛馬思想，鼓勵組織乘馬俱樂部，並自1930年代末期後，開始舉行軍馬祭。而訓練狗隻，廣泛應用於軍、警及守衛用途，則始自1910年代的臺灣與朝鮮，用以搜索殖民地的反抗者，1920年代以後軍犬的改進更大幅進展，1930年代後大舉投入戰事；在殖民地中，軍犬與殖民者的權威形象常相互聯結，臺灣人甚至以狗來形容日本殖民統治者。¹³ 至於日本軍方飼養及訓練軍鴿於通信，則自20世紀初起，考量氣候的關係，曾引入比利時及法國種，1922年臺灣基隆要塞司令部也試行引進飼養，在島內城市間及澎湖與望安間試放，起初是作為漁

11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2011), p.130.

12 兩次世界大戰中動物運用的數字，引自マルタン・モネステイエ (Martin Monstier) 著，吉田春美、花輪照子譯，《因說動物兵士全書》(東京：原書房，1998)，頁 11。有關1931至1945年間，蔣中正在中國對於軍馬、軍鴿的整備工作，可參見楊善堯，〈動物與抗戰：論中國軍馬與軍鴿之整備〉，《政大史粹》，期 21(2011.12)，頁 129-156。其中有關軍鴿在中國的歷史，楊善堯描繪蔣中正命令軍政部陸軍署交通司特種通信教導隊於1931年起，從日本購回鴿子，以日人為教官，學習養鴿與訓練，其後並建立以南京為中心的六大鴿子通信站。但另一本於2004年在北京出版、探討中共解放軍軍鴿歷史的著作，則強調雲南的重要，提及二戰期間雲南省主席龍雲引進軍鴿，由美軍軍鴿、日軍軍鴿及中國國民黨軍隊三方面的軍鴿組成雲南一地的軍鴿種子，1950年後，中國復向蘇聯學習軍鴿飼養與訓練技術，而使當地成為今日中國軍鴿隊的主要基地。參見：陳妍、塞夫、林海編著，《軍鴿》(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頁 6-14。

13 據統計，1944年時日本帝國軍犬數，其本土有815隻，滿洲有3,260隻，朝鮮與臺灣各有130與110隻，中國戰場有2,723隻，南方軍使用數有730隻。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pp. 130-144. 日本南方軍與在中國戰場的軍犬數係參考：今川勳，《犬の現代史》(東京：現代書館，1996)，頁 67。

業海上通信等民間使用，逐漸帶動臺灣愛鴿人士組織愛鳩會、榮鳩會等，並形成民間飼養熱潮，於1930年代進入戰爭時期後其勢更盛。¹⁴臺北因為是全島政治中樞，總督府、軍方及相關民間單位，也常在此地舉行軍用動物活動。¹⁵

軍用動物的歷史千頭萬緒，本文僅擬專注討論臺灣動物園與這些被視為「活武器」的動物之間的關係。如前所述，動物園在戰爭時期成為提升戰爭道德（war moral）的重要場所，是舉辦軍用或國家用動物的展覽、愛護與追悼的愛國活動的展演場，透過種種活動，宣揚在國家與軍隊的大背景下，人們與這些動物建立的友愛與親近關係，強調牠們對公領域與私領域的貢獻與重要性，藉此向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對家庭成員進行精神動員。利用動物來進行市民的精神教育與藉以指導兒童舉措，在一些城市動物園也有案例，在臺灣戰爭時期的動物園，這種宣傳也相當明顯。¹⁶

戰爭宣傳中強調的重點，可以日文「愛之絆」一語含括。所謂「絆」（kizuna），在日文中常用來形容人與人、或人與動物之間不能切割、相互依存的緊密聯結關係，而戰爭時期的宣傳則往往把「國家與戰爭」當成建立這種「愛之絆」的關鍵。因此，在一篇談論軍用動物的文章中如此說道：「我皇軍在戰場上，人與人、人與動物、甚至動物與動物之間，都結

14 1939年時臺灣軍參謀長即曾在臺灣傳書鳩競翔大會中，大力宣揚傳信鴿的品種改良訓練與國防的密切關係。〈戰爭目的の遂行に 傳書鳩の役目は大〉，《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11日，版3。

15 如1941年10月31日在臺北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由臺北州畜產協會執行日本中央通令全帝國一致舉行的「支那事變軍馬祭」，參加者達萬人，包括總督長谷川清、臺灣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及民間團體等。〈支那事變軍馬祭〉，《臺灣畜產會會報》4:12(1941.12)，頁80。

16 城市動物園利用動物加強市民與兒童的精神教育的例子，如1914年時美國Boston動物園中大象的運用：象因為公共捐款而被購入，報刊報導中，將象形容為好行為、守規矩者，牠並被安排在城市節慶中揮舞美國國旗，協助鼓動愛國情操。此外，人們觀看動物園大象所留下的回憶，往往呈現純真美好童年的鄉愁感，這種情緒類似是一種旅遊紀念品（souvenir），也是形塑城市居民對市民與野生動物間關係看法的一個重要機會。Elizabeth Hanson, *Animal attractions: nature on display in American zoo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9-70.

成了強烈的愛之絆」。請注意其中皇軍與戰場二個名詞的重要，¹⁷許多戰時的宣傳，都是用「某某動物與軍隊」為題，強調這種動物在軍事上的功能，以及牠和士兵或一般人之間因此而建立的親密關係，而這種跨越公私領域的人與動物的情感，在戰爭時期也被解釋成和家人之間的愛戀融合在一起，依此邏輯，人與人之間、動物與動物之間、人與動物之間，都因為對國家與軍隊的「奉公」，而緊緊地串聯成一體。

戰時後方的動物園，如何對戰士的家屬進行人與動物的「愛之絆」宣傳？1942年《臺灣日日新報》有一篇報導是有關動物園的戰爭宣傳很好的例子，以「象與軍隊」為題，用照片與文字描述一位母親帶著孩子到圓山動物園看象（亦即「マーちゃん」，戰後漢譯名「瑪小姐」）、騎象，想念在南方前線當兵的父親；一方面是兒童在後方的動物園騎象，另一方面是軍人父親在東南亞前線騎象，將後方與前線兩處原本距離遙遠的場所，透過動物（象）的媒介，把家族成員間溫暖的情感，轉化為對戰爭與國家的熱情，強調象和「皇軍勇士」協力為「共榮圈」戰爭所作的貢獻，藉此軟性方式美化戰爭，而進行家族的精神動員。象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英國軍隊在東南亞戰線中大量運用於叢林中，令其築橋、搬運補給與彈藥鎰重，¹⁸報導中描述象如何為軍隊架橋以及在巡察叢林時發揮的功能。天真的孩子在動物園裡問道：「哎，媽咪！究竟是之前報紙報寫的英勇作戰的軍隊伯伯的象比較大，還是動物園裡這頭象比較大？爸爸在戰場要快點騎上大象喔……我也想像看看大象！」並附上一張兒童在動物園裡

17 原文為日文，筆者酌予漢譯。宮本佐市，〈戰地に於ける 兵士と軍用動物（下） 特に臺灣の軍用犬に就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17日，版3。

18 有關英國東方集團軍（後來的14軍團）中，以James Howard Williams（即Elephant Bill）為主所組成的大象軍團活動，可參見：Vicki C. Croke, *Elephant Company: The Inspiring Story of an Unlikely Hero and the Animals Who Helped Him Save Live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2014. 該書從人與動物的關係著眼，以傳記的方式，描繪Elephant Bill自1920年代至1950年代末後與大象的遭遇以及活動，其中第三部分（頁205-290，第21-26章及終曲）尤以軍用象為主軸，有助於吾人明瞭英國皇家軍團中大象軍團如何組成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作者特別突顯了人與動物的情感與歷史的關係。

騎象的照片，媽媽坐在小孩身後，扶住他，以協助他高舉雙手呼喊「萬歲」。¹⁹



圖2 1942年兒童在圓山動物園騎象喊「萬歲」

資料來源：〈動物園に偲ぶ 南方戦線の“象と兵隊”〉，《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2月26日，版4。

軍用動物相關活動的舉辦其實都有官方或軍方的授意，特別是中央的內務省與陸軍方面，常主持軍用動物宣傳展覽活動的組織工作。日本的帝都動物園——上野動物園自1930年起，每年初依當年度的干支為主題舉行動物展覽會，首次展出的是馬，之後成為一年一度的傳統。當時日本帝國已將走入所謂「十五年戰爭」（泛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戰爭結束後這段時期，本文認為可借用來觀察動物被逐步增強運用於戰爭的情形），軍馬被日本陸軍稱為活武器，待遇比人還好，從馬開始動物展，並不是一項偶然，到十二年後，即1942年，干支展的主題明訂為「軍用馬展覽會」，可

19 〈動物園に偲ぶ 南方戦線の“象と兵隊”〉，《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2月26日，版4。

視為日本帝國將動物作為戰爭資源而加以宣傳愛護的一個例子。²⁰ 軍用犬的展覽情形亦同。²¹ 動物園人員往往需配合動物軍用的工作，如上野動物園園長古賀忠雄1941年應徵入伍後，在陸軍獸醫學校訓練宣傳軍用犬與軍鴿，並教授軍用動物學。1940年代戰時上野動物園發行供遊客遊園參考的地圖，也一直印著軍用動物的故事。²²

在臺灣的動物園中，軍馬、軍犬及軍鴿的宣傳活動，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之後的動物祭，此外主要活動是展覽會、競技會，包括軍用動物的訓練演出。動物的宣傳展覽起初具名的主導者較偏地方層級，由動物園的主管機關，如市政單位社會課等規劃一般性的動物展示內容。1930年代末期以後，隨著戰爭的腳步加快，軍部直接主導，動物園退居配合的角色，甚至1940年後軍用犬展覽從市郊的圓山改至城中的新公園（即今二二八公園）舉行。

1934年動物園配合狗年干支，舉辦兩天以狗為主題的展覽會，雖以增殖軍用犬為未來的期望，但展覽會中並未以軍用犬為唯一內容，也納入寵物犬、守衛犬、獵犬等，展期內每天舉行為時四十分鐘三次的表演，內容是狗的傳令、搜查、跳躍連續障礙物或高物障礙、爬牆登高、爬樹、爬梯子、雙犬併擊等，都是利用狗擔任軍警工作時的項目，但還沒有顯出完全的軍事演習項目。1936年起，展覽主題改為「軍用犬」，由軍部提供10頭軍用犬參展，派出第一連隊軍犬班班長指揮軍犬訓練實演。²³ 軍方主導展

20 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資料編）》（東京：東京都生活文化局廣報部都民資料室，1982），頁 666-667。

21 在戰爭如火如荼舉行期間，日本帝國內常舉軍用犬獻納儀式，1940年代甚至曾發展出「犬貓不要論」，否定動物作為家庭成員的意義，完全以軍用犬為尊。諷刺的是1944年底，日本軍需省等軍方單位推動民間捐出犬貓，以讓軍方能運用其毛皮。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Loc743、750.

22 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東京：東京都生活文化局廣報部都民資料室，1982），頁 170、184-185。古賀忠道在陸軍獸醫學校不久，即派往南方戰線，但曾因病而在臺北住院兩個月。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Zoo Policy*, Loc696。

23 〈犬の展覽會、圓山動物園で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6月1日，夕刊版2。〈圓山動物園で 軍用犬の展覽會 軍部からも十頭出品〉，《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17日，版9。

示，更彰顯犬的軍用性格，也讓公眾對戰爭與動物的關係產生更進一步深化的印象。

戰後圓山動物園依然扮演作為政府精神動員場所的功能，在1949年「七七抗戰紀念日」時，由兵工署研究院主導展出各國新兵器及我國自製兵器，如「抗戰期間發揮莫大力量之中式七九型槍」，「以便本省人士研究」、「增進青年興趣」、「提倡社會教育」、「促進國防科學」。²⁴

以上是有關動物園作為軍事宣傳空間的論述。在軍用動物的繁殖技術上，動物園也曾扮演部分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相較於軍馬，日本帝國軍方對軍犬的飼養繁殖技術較不熟悉。²⁵戰爭結束後，日本軍方已注意到軍犬對戰爭的正面效益，開始調查研究並派員到歐洲取經。²⁶隨著軍犬逐漸受重視，1925年時，臺北動物園也適時提供有關軍用犬繁殖培育技術的支援。除園內軍犬被送與朝鮮狼交配，進行混種測試外，²⁷1935年臺灣成立的軍用犬同好會中，動物園囑託勝浦輝負責協助軍犬飼育等問題，他於1930年代擔任動物園獸醫兼主任，對各種動物的醫療實務經驗多過學理研究，並不能算是軍犬的專家，這項軍犬飼育的指導責任，純粹是因為戰爭時局動物園配合軍方的動員而擔任。就實質成果看來，當時臺灣等熱帶地區在軍用犬的繁殖上成績並不特出，滿洲、朝鮮、青島等地才是當時日本主要軍犬種犬產地，在軍犬繁殖、登錄、檢查、訓練、競技與展覽上，技術列為日本帝國前茅。²⁸

24 〈七七抗戰紀念日 省會各界明日集會紀念 在臺北動物園展覽兵器〉，《民聲日報》，1949年7月6日，版4。

25 日本陸軍自1873年就開始推動馬醫學，培訓馬醫生，結合源自中國、荷蘭與幕末等馬事獸醫學與1850年代後傳來的西洋獸醫學，重構馬醫學教育，而馬學也一直和羊學、豚學及其他家畜學列為農學中獸醫的主要學習科目。篠永紫門，《日本獸医学教育史》（東京：文永堂，1972），頁13-31。

26 〈軍用犬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10月14日，版7。

27 〈春の動物園 朝鮮狼と獨逸軍用犬の混血ツ子はどんなものが生れるか〉，《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4月15日，版7；〈春！動物園に訪れる 朝鮮狼には犬のお嬢さんお嫁さんがなくて困る猩猩〉，《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2月18日，版7。

28 日本在軍用犬方面的技術是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才逐漸摸索改進，帝國內最早牧羊

除軍用動物的宣傳與業務支援，在1940年代戰爭方酣的時期，臺北動物園也在日本帝國南方政策中，分擔了部分有關佔領地動物資源調查的任務。其中海南島的部分，自1939年2月10日起被日本海軍佔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後歷經6年，在此之前，日本帝國對海南島所作的學術調查偏重植物類，經濟性植物尤其受到重視，軍事佔領海南島後，更有系統地派出學術調查團，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40年至1941年間四次的海南島農林業調查團，以及以海南島重要資源為對象的龐大學術調查，分別包括第一回的生物學、農學、地質學，以及第二回的經濟民族關係、理農學、農藝化學等，臺北帝國大學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並於1943年3月13日成立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同年底11月在海南島榆林設置實驗所，研究海南島「海產有害動物」為該所三大目標之一。²⁹在上述官方大舉的學術調查團外，臺北動物園園長赤松稔亦於1943年到日本佔領區海南島調查一個月。回臺後受訪，談及海南島擁有豐富的「珍貴動物」，建議配合日本帝國戰爭時期南進政策，擴大對華南與南洋動物資源的運用。他初步調查發現海南島有很多日本內地及臺灣未曾見過的動物，認為其地理更接近於法屬印度支那（即今越南、高棉、寮國等），未來可以發展為日本飼養南方動物的地方，取代當時昭南（即今新加坡）的地位。他也以臺北動物園園長的立場，希望能將海南島的珍貴動物帶回臺灣的動物園，給這裡的「好孩子」觀賞。³⁰從戰時臺灣殖民地的例子，可看到帝國權力與動物園動物蒐藏之間的關係，臺灣動物園在動物調查等相關事務上扮演了帝國先鋒的角色。

犬俱樂部於1928年設立，1932年成立帝國軍用犬協會，1937年起陸軍開始大量購買軍用犬，1940年代開始試用秋田犬。在這種技術演進的過程中，1930年代軍方派員參加展覽會擔任審查員時，許多相關獸醫部人員對馬相當熟悉，但對狗的認識有限。今川勳，《犬の現代史》，頁49。

29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頁206-258、327。

30 〈珍しい動物 動物園のおぢさん海南島のお話〉，《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2月21日，夕刊版2。

三、動物慰靈祭與動物園

戰時官方所舉的所謂愛國活動中，與動物相關的慰靈祭的儀式化是其中一個著例。動物慰靈祭是日本統治時期引入臺灣的祭典，事實上除了動物之外，也有以具有戰功者為撫慰對象的慰靈祭。傳統漢人文化中已有動植物崇拜的風俗，以臺灣為例，對高齡樹木如榕樹及刺桐的崇拜並不少見，而動物方面，則有崇拜貓、蛇、狗、馬、牛的例子，如嘉義羅將軍祠祭祀戰死之馬，二十三將軍祠合祀戰死之狗，牛將軍廟供奉水牛，宜蘭也有將貓稱為將軍爺並祭祀者。³¹但日治時期更將動物慰靈祭定期、定點儀式化，並且廣及應用到更多機構或產業場所，特別是日治時期在臺灣的動物園、醫療機構及畜產界所設立的動物祭祀活動或紀念物設立，多由日人主動促成。研究日本動物慰靈文化的文化人類學研究者Elmer Veldkamp認為，「動物供養」及「動物慰靈」兩種針對動物亡靈舉行的儀式，是結合日本傳統世界觀與佛教思想而產生，含有動物亦可成佛以及防止死亡動物作祟的雙重目的。近代國民國家之前，日本也有源自佛教的戰末軍馬祭祀歷史（尤常以馬頭觀音塔的形式表現），但隨著近代軍馬在騎兵、砲兵的輓馬、馱馬等軍事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日本官方倣習對戰沒兵士設立忠魂碑，在日清及日俄戰爭後，增加了動物慰靈碑的紀念形式。³²自1910年起每年舉行警犬慰靈祭，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在奉天舉行戰歿軍馬慰靈祭（之前先在大連舉行戰死者慰靈祭），之後對陣亡者及動物慰靈的風氣大為流行，上野動物園也在同年建動物慰靈碑，並在碑前舉辦動物慰靈

31 丸井圭次郎，〈臺灣宗教思想論（八）〉，《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4月15日，版3。嘉義水牛公園之牛將軍廟之訊息承蒙匿名審查人指點，謹致謝忱。

32 松崎圭，〈近代日本の戦没軍馬祭祀〉，收入中村生雄、三浦佑之編，《人と動物の日本史 4 信仰のなかの動物た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頁126-158。研究者藤井弘章認為，日本的動物慰靈或供養具有地區特色，例如其東北地區常奉祀不可食用的海龜，而九州一帶則常見對於鯨魚、馬、山豬、鹿等之供養塔；過去動物供養多出於對死亡動物的畏懼心理，現代則加重了對動物的感謝。藤井弘章，〈動物食と動物供養〉，收入中村生雄、三浦佑之編，《人と動物の日本史 4 信仰のなかの動物た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頁223-240。

祭。動物慰靈的風氣在日本至今仍持續不衰，常民生活中，包括醫院及寵物靈園，也常可見到為實驗動物或近身的伴侶動物舉辦慰靈祭的例子，臺灣醫學機構也有這項歷史文化的遺留（通常稱為犧牲動物慰靈祭）。Veldkamp認為這些儀式的舉行，在戰爭時期更因為人們將動物極端資源化，特別是以動物的死亡為前提的動物利用與活用，尤其是軍用動物的消費，而更重視動物的慰靈，也因此戰爭時期動物供養與慰靈儀式特別流行。³³戰後慰靈祭持續舉辦，隨著人類社會與動物關係的變化，增添更多非戰爭因子，這項祭典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其實也有很深的記憶召喚的意味，尤其是應用於人與陪伴動物的關係時。

臺灣的動物慰靈祭始自1920年代，大盛於戰時的1930、1940年代。除祭典外，同屬動物慰靈的建碑紀念，也被廣泛用於漁業、畜牧業、屠宰場、醫院等處，戰後動物園也樹立了死亡動物紀念碑。建碑的意義在於對靈界「鎮」的文化脈絡中，透過儀式，擬達到對死者（為人類犧牲的動物）的安定與彰顯的目的。³⁴日治之前，臺灣並無樹立畜魂碑（獸魂碑）的傳統，自1920年代起，臺灣各地屠獸處所陸續樹立畜魂碑。³⁵此種石碑的存在，顯示人們在肉食文化中，對於因為人類而死亡的動物作祟的恐懼，立碑工程常以屠宰業者為主力，在地方政府協助下進行。³⁶

臺灣第一次試辦動物慰靈祭是在1925年，由圓山公園內佛教臨濟寺日

33 エルメル フェルトカンブ(Elmer Veldkamp)，〈英雄となった犬たち 軍用犬慰靈と動物供養の変容〉，收入菅豊編，《人と動物の日本史 3 動物と現代社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頁 44-68。

34 参考大丸秀士，〈動物園・水族館における動物慰靈碑の設置状況〉，「第9回ヒトと動物の関係学会学術大会」，2003年3月12日，ヒトと動物の関係学会網頁：<http://www.hars.gr.jp/taikai/9th.taikai/9thconference.htm#gaiyou>，2011年11月10日點閱。

35 臺灣目前仍有幾個地方可見到畜魂碑或獸魂碑，如臺北市有北投、四獸山與木柵等三處，另有網友整理臺北、新北市淡水、宜蘭市、臺中霧峰及清水等其他地點，參見「畜魂碑大集」：<http://www.wretch.cc/blog/yeh75731/9599345>，2013年1月27日點閱。

36 亦可參考有關慰靈等有關死亡觀的探討，如：國學院大學研究開發推進センター編，《慰靈と顯彰の間 近現代日本の戦死者観をめぐって》（東京：錦正社，2008），頁 115-130。

曜學校主辦，³⁷ 該寺與動物園同位於圓山公園內，有地緣關係。早在1923年，同樣由佛教團體開始，大阪市日曜學校聯合會已在天王寺動物園舉行「死亡動物追悼會」，猜測臺北的舉辦可能是受到大阪動物園所影響，而當年臺北也已開始高舉「愛護動物」之名。³⁸ 臺北動物園首屆正式的動物慰靈祭始自1929年，時間大約在每年秋季的11月23日。³⁹ 此後祭典中固定以「動物愛護」為主題，儀式的進行係以安慰逝去動物之靈為主。⁴⁰

舉辦的單位早期臺北圓山動物園居於協辦角色，後逐漸改為由動物園與佛教日曜學校二者合辦；1936年起佛教團體從日曜學校改為臺北佛教兒童聯盟。⁴¹ 參與的單位逐年增加，除主辦單位外，動物園的主管機關臺北市市役所必派代表到場，另來自各種利用動物的相關單位，如與實驗動物相關的中央研究所、臺北醫專、臺北帝國大學畜產學及動物學教室、臺灣總督府獸疫血清製造所，⁴² 與食用動物產業相關的臺北乳業畜產組合、臺北屠場組合、臺北州畜產聯合會，或與軍用動物相關的臺灣軍獸醫部長、武德會馬術部等。⁴³

37 所謂佛教日曜學校，即類似基督教的主日學學校，以教導兒童為主的週日佛教教學活動。

38 〈本社ラチ才受信〉，《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0月2日，版5；〈本島では初めての試み 日曜學校主催の動物祭 可愛い坊ちやん嬢ちやんの手に依て圓山動物園内で盛大に行る〉，《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1月12日，版5。1923年時臺灣也已設立第一個動物保護社團——臺灣動物保護會。

39 為何選擇此一日子，筆者推測係因1873-1947年間，此日為日本國定假日（新嘗祭祝祭日），以市民為對象的動物園在假日中舉行動物慰靈祭，有利於遊客參與。

40 依上野動物園的資料，該園戰爭結束前舉行過3次動物慰靈祭，分別是1930、1936、1937年，其中1937年特別針對軍用動物。若這份資料是完整確實的，則臺灣的動物慰靈祭的舉辦，不但早於上野動物園，舉辦的頻率也遠高過該園。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頁667。

41 〈圓山の動物祭〉，《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1月23日，夕刊版2。

42 使用甚多實驗動物的淡水的獸疫血清製造所，至少自1936年起，也自行在年底或年初舉辦「犧牲動物慰靈祭」。以1936年為例，參與者有臺灣軍獸醫部、中央研究所、臺大醫學部等醫療單位，以及淡水郡守、街長、臺北州畜產聯合組合、新竹州農會等，佛教幼兒園的幼兒也參與。1941年的參與人員另有總督府技師等。〈雜報 犧牲動物慰靈祭催さる〉，《臺灣之畜產》4:12，1936年12月，頁25；〈犧牲動物慰靈祭〉，《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2月21日，版3；〈犧牲動物慰靈祭〉，《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2月18日，版3。

43 〈圓山動物園舉慰靈祭〉，《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1月22日，夕刊版4；〈動物慰靈祭 廿一日から各種の催〉，《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1月20日，夕刊版4。

祭典的流程大致為：為亡靈頌經；由日曜學校學童合唱「佛陀的孩子」（「佛の子供」）；獻花；燒香；主辦單位讀祭詞；朗讀祭文。致祭者除人類之外，狗、猿猴、大象等動物亦被安排「盛裝牽至祭場前，由園丁指揮參拜」。⁴⁴大象在祭典中很受注目，牠穿著大紅禮服，面向滿佈花環及供品的「群生精靈」牌位祭壇前，跪下後肢並燒香。而猿猴亦盛裝與會，穿上人們只有在正式儀式中才會穿的燕尾禮服（morning dress）祭拜，代表組織儀式者期望塑造的莊重與肅穆氣氛。⁴⁵

1937年後，隨著戰爭時期的到來，軍用動物被冠上參與「聖戰」的「優秀的無言勇士」⁴⁶之美稱，行之有年的動物慰靈祭也改以戰歿的「皇軍將士」軍馬及軍犬（1939年起再加入軍鴿）為主角，列名參與者則強調軍方或與軍用動物關係密切的臺灣軍獸醫部、帝犬北臺灣支部與帝犬南臺灣支部（1939年改為大日本軍用犬協會臺灣支部）、鐵道部犬友會。⁴⁷在動物園之外，臺灣各地也在「銃後動員」的情況下，紛紛由軍方支援舉行各種動物慰靈祭，如1938年中壠公學校舉行的軍用獸類慰靈祭，同時有獻納軍用牛，由臺灣軍司令部等派人參加；⁴⁸1941年，臺北東本願寺別院勤修

44 至少在 1930 年舉行第二屆的動物慰靈祭起，大象出席作為致祭代表。本文上述動物慰靈祭流程，係以 1932 年為例說明。〈人間や動物の盛んな参列 動物代表、象君の焼香 臺北基隆各日曜學校主催 圓山動物園の動物祭〉，《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1 月 24 日，版 3；〈圓山動物園舉慰靈祭〉，《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22 日，夕刊版 4；〈動物園及兒童聯盟盛舉動物慰靈祭 廿三日在圓山動物園〉，《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1 月 24 日，夕刊版 4。

45 〈真赤な晴着の象君もお詣り圓山で動物慰靈祭〉，《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1 月 24 日，夕刊版 2。

46 日文原文「天晴れ無言の勇士」。

47 〈けて圓山動物園で無言勇士の慰靈祭象君も参列して禮拜〉，《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11 月 24 日，夕刊版 2。1939 年 10 月 24 日起，日本另外特別為祭祀在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陣亡的軍馬而設立軍馬祭，雖與本文相關，但屬另一脈絡，本文不再探討。參考戴振豐，〈日治時期臺灣「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形成與進行（1936-1945）〉，《政大史粹》，期 6（2004.06），頁 61-94。軍犬的慰靈也與日本在東北的侵略有很深的關係，可參閱 Aaron Herald Skabelund 有關戰時日本帝國對狗的記憶型塑的探討，見 Aaron Herald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pp.167-170.

48 當年起在臺灣也常見軍用犬獻納的募集公告。〈軍用獸類慰靈と 軍用牛の獻納式典 きのふ中壠郡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3 月 4 日，版 7。

「軍用動物慰靈法要」，帝國軍犬協會臺北支部派員向陣亡軍犬及軍鴿上香，專人演講前線軍犬事蹟，舉行軍犬訓練表演；嘉義佛教聯合會也在該市的公會堂舉行戰歿勇士追悼會的軍用動物慰靈祭，由帝國軍犬協會臺灣支部支援，同時表演軍用犬調訓成果，臺南等其他地區也陸續舉辦。臺灣護國神社⁴⁹於1942年舉行鎮座祭後，次年總督府及軍司令部也計劃在該神社前建造軍用動物慰靈塔，但並沒有看到完工的報導。⁵⁰由以上種種例子可知動物慰靈祭在戰爭時期，被利用作為提升市民（或帝國國民）「戰爭道德」工具的實際情形。

戰後動物慰靈祭曾取消數年，但因為該祭祀具有說明人與動物間關係的儀式性功能，圓山動物園於1950年恢復舉行動物慰靈祭。祭文中強調動物為市民生活付出的貢獻，園方說明：「慰靈祭的用意是提醒人們，這些可愛的動物，絕大多數是老死籠中，人們從牠們身上獲得歡樂後，更該懷抱著感恩之心。」強調動物的「可愛」，「老死籠中」，助人取樂的功能。戰後初期的動物慰靈祭仍用佛教儀式，流程也與戰前頗多類似之處，主持祭禮者仍為行政首長（市長或教育局長），但讀祭文的是國語推行委員會代表；除了人類之外，也重視動物代表。在1954年一張圓山動物園的照片中，由大象（馬蘭）代表全園動物跪拜致祭，但從跪後肢改為跪前肢，所披禮服亦改為五彩條紋狀。⁵¹事實上動物致祭可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動物表演，在動物表演最興盛的1950年代與1960年代，於慰靈祭中為動物誦經的不是佛教法師，而是動物園調訓的猴子。據當時負責此一訓練的飼育人員陳德和先生回憶說，他在佛經中每隔數頁就放置一顆花生，猴子為

49 已拆毀，地點位於今大直忠烈祠。

50 〈軍用動物慰靈法要〉，《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5月20日，夕刊版2；〈戰歿勇士追悼會 軍用動物慰靈祭と園犬實演もけふ嘉義市公會堂で〉，《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6月5日，版4。

51 〈生靈塗最堪哀 奠你杯酒我徘徊 圓山祭典悼歿亡動物〉，《中央日報》，1950年5月11日，版4；照片是1954年5月28日的祭典，見聯合報知識庫，〈典藏歷史聯合報一甲子記錄時代 1954/5 動物慰靈祭 典藏歷史聯合報一甲子記錄時代 1954/5 動物慰靈祭〉，《聯合報》，2011年11月29日，版A6/生活。

吃花生而持續看著佛經，使圍觀群眾以為猴子正專注於佛經上。⁵²此外，也有在慰靈祭結束後接著舉行各項活動，包括動物展覽會，甚至鬥雞，放軍鴿，或是各式各樣的動物表演。

戰後動物慰靈祭雖存留下來，但去除了戰爭時期的軍事因素，加進新的文化因素，祭文所強調的內容也與時俱變。首先是祭典舉行的時間，戰前以秋季為主，戰後改至春夏，尤其漸以中元節為主要趨勢，與臺灣漢人民間傳統普渡信仰配合。⁵³另一種變化是除採佛教儀式，也開始輪流使用道教儀式。在美援時期，基督教儀式也曾出現在醫療機構主辦的動物慰靈祭。如前述，1930年代以來，臺灣的醫學院中一直有舉行慰靈祭的傳統，包括對解剖大體的慰靈，以及對實驗動物的慰靈。臺北市成立動物之家後，安樂死的動物也成為慰靈的對象。在一部臺灣省製作、有關動物慰靈祭的影片中，⁵⁴留下1950年代美援進入臺灣後，美軍勢力影響下，醫學單位舉行動物慰靈祭儀式的大概情形。影片一開始是舉行動物慰靈祭的場所，亦即臺北市公園路7-1號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⁵⁵先舉行佛教儀式，在戶外空地上架起許多小花圈，擺置香蕉等水果的香燭供桌，僧人圍桌誦經行法事，而蒞會官員陸續入場；另一方面則是教堂內舉行的基督教儀式，穿著旗袍的婦女站在十字架前開場，牧師手持聖經，帶引座上聽眾

52 鄭麗榕訪問、紀錄，〈陳德和先生訪問紀錄稿〉，未刊稿，2011年5月26日於陳德和先生臺北市家中。

53 〈普度動物亡靈 葉金川主祭 去年六千多隻流浪狗安樂死 上萬動物為學術捐軀〉，《聯合報》，2004年8月28日，版B2/北市要聞。

54 本部片子的製作時間為1950年代，而1945至1967年間，臺北市為臺灣省轄市，之後升格為直轄市。此部片子藏於國家電影資料館。

55 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隸屬於美國海軍醫學研究院（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MRI），是美國海軍為進行東南亞醫療研究而成立，與臺灣大學合作，於1957年11月6日由美國海軍中校 Robert Allan Phillips 與臺大醫院高天成院長共同揭幕，美方人員視同外交人員，1979年4月15日降下美國國旗，共進行21年5個月的東南亞熱帶醫學（含肝炎）研究。後遷至菲律賓，至少又另增加印尼一處研究所。NAMRU-2 在臺灣的研究，實係延續戰前日本的熱帶醫學研究傳統。林炳炎，〈U-2: 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2 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http://pylin.kaishao.idv.tw/?p=853>，2012/11/10 點閱。

低頭禱告，除本地婦女與小孩外，也有外籍女子及兒童參與。之後一群穿著白上衣、花裙或短褲、白襪白鞋，清湯掛麵頭的小女孩獻唱詩歌。⁵⁶ 婦女與孩童（特別是女孩）是這次儀式中顯著的身影。

而在祭文的變化上，戰爭時期重視軍用動物的貢獻，戰後初期強調動物帶給人們的歡樂，近年，如2012年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慰靈祭的新聞稿，在宣傳上則聚焦於生命教育主題，強調「動物園展示的野生動物是各種不同樣態生命的呈現，從正面角度讓社會大眾了解死亡並尊重生命，把對動物的感恩之情，轉化為關懷生命與保護自然環境的力量」。⁵⁷ 在此新聞稿中，也提及園內仿日本上野動物園，於2004年設立生命紀念碑，要禮讚生命，紀念生命，將包括動物死亡的議題，都納為動物園生命教育展示的內容，也希望觀者能思考人與自然之間密切的關係。其中所強調的生命教育以及人與自然的主題，實彰顯20世紀末以來，國際間動物園與水族館界，從全球環境與保育潮流中，所發展出的主要發展策略。⁵⁸

四、戰時動物園的「猛獸處分」

二次大戰後期，1943年8月至戰爭結束前，日本帝國內的動物園曾執行「猛獸處分」政策，臺北動物園的「猛獸」並沒有倖免。雖然已過了將近70年，但關於這些被毀滅的動物，特別是曾被命名的大象，牠們的故事像家人的往事般，不斷被重新創作、書寫與述說；大阪天王寺動物園並自2005年起，每年在8月舉行相關展覽以資紀念。⁵⁹ 反戰的日本知名作家村上

56 臺灣電影文化公司製作出版，「動物慰靈祭」，1961年8月1日出品，國家電影資料館影片。

57 參考臺北市立動物園提供的新聞稿：〈普渡：感恩往生動物的陪伴、教育〉，2012年9月10日。

58 有關1993年第一版世界動物園保育方略（WZCS, World Zoo Conservation Strategy）國際間動物園與水族館的整合目標，以及和臺灣動物園的關係，可參考：鄭麗榕，〈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3，其中第五章。

59 除大眾媒體的創作外，學院中也有猛獸處分相關的記憶透過口傳流傳下來。如東京大學農

春樹，曾在1990年代以新京（今中國長春）動物園為主題，想像戰爭末期該動物園執行軍方猛獸處分政策的情形。⁶⁰村上稱這種行為是「不得要領的虐殺」，對戰爭時期執行政策者心靈上的自我扭曲，將責任委諸命運、逃避良心譴責的現象刻畫極深。⁶¹動物園經營者對於原本費心蒐集、圈養的動物，因為戰爭的關係，而主動且有計畫地進行毀滅，並使用「處分」的字眼，隱然將動物視為財產或是破壞秩序者，與慰靈祭宣稱的愛護動物精神，強調人與動物關係的戰爭宣傳，無論如何都是矛盾的，因此當書寫者回顧這一段人與動物關係的歷史時，顯示出的創傷也特別深。

然而臺灣的動物園由於戰後經歷改朝換代的變革，檔案文字失落或被塵封，許多戰爭結束前動物園的集體記憶被遺忘，在這個主題上似乎相對沈寂，相關著作觸及臺北圓山動物園猛獸處分情形時，也常有錯誤。⁶²回顧動物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情形，思考動物與人的關係，我們要如何召回臺灣動物園的這一段歷史記憶？似乎最直接的資料還是要翻回1943年12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一份有關臺北市動物園的報導。標題上明

學部教授、博物館館長林良博曾提及，傳說他的研究室中留存了戰爭時期上野動物園被殺的象；象的遺體在東京千住燒却場處分了，但解剖會上東京帝大學生偷偷帶回象的下顎骨，存在東京帝大，位置正在後來林教授的研究室中。由於文獻不徵，林教授認為愛護動物者實不欲回想戰時「殺處分」的往事，因此上述象骨留存的說法真偽難辨。林良博，〈東京大学に眠る上野動物園の宝物〉，《とうぶつと動物園》，50:1（574號，東京：東京動物園学会，1998.01），頁3。

60 新京博物館及動物園歷史研究者犬塚康博認為，依佐藤昌的《滿洲造園史》（日本造園修景協會，1985，頁90）、越沢明的《滿洲國の首都計畫》（日本經濟評論社，1988，頁160），1945年8月俄軍入侵滿洲的同時，也藥殺了新京動物園的動物，因此，村上春樹小說中所述日軍槍殺動物之情節，是虛構而非真實。感謝網站「戰時中の動物園」（<http://ppt.cc/xLjf>）站主三上右近先生指教。

61 在章節的安排上，村上春樹描寫獸醫與士兵「處分」了新京動物園的動物後，接著又被命令去屠殺「滿洲國軍士官學校」抗命的學生，亦即從動物到人都是戰爭暴力下的受害者，前一段的章節名稱是「不得要領的虐殺」，後者稱為「第二次不得要領的虐殺」，敘述口吻是從執行者的角度來書寫。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襲擊動物園（或不得要領的虐殺）〉，《發條鳥年代記 第三部刺鳥人篇》（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7），頁75、216。

62 如 Ian Miller 認為日本帝國園在其內地之外三大動物園，包括臺北動物園，猛獸處分時間為1944年年底至1945年，而實際上臺北動物園首次動物處分時間為1943年12月底。Ian Miller, Loc3511.

示：熊與虎都為國犧牲，預備空襲而進行猛獸處分，為少爺、小姐朋友剝製牠們。文中說明：為確立與完備防空體制，東京及大阪動物園已經屠殺園中猛獸，臺灣既然必將面臨空襲的情勢，考慮到空襲時的危險，12月27日上午8時半將先處分熊及羆。殺戮的方法幾經研究，決定採用電氣法。殺戮後的猛獸剝製永久保存，作為教育資料外，骨骼及內臟提供臺大研究室為研究資料。並將陸續處分虎、豹等。在少爺及小姐中最擁有人氣的猩猩「一郎先生」，因為是國寶，將對其檻舍加以補強予以保護。臺北市當局並發表如次的談話：

時局日益逼近，關於本市動物園猛獸之處置，已預為考慮。本年九月初以航空信詳詢內地主要都市的情況，得知東京上野動物園業於八月、九月間全部處置，而大阪市馬戲團等也已處置。在此情勢中，鑑於臺灣本島比內地更有空襲必至的事實，需預為處置猛獸，適當考量治安上及防空對策以及市民的不安等，乞求相關各方面能諒解，不得已的事是理所當然。由於得到以上指示，此回處分的猛獸包括獅子、虎、豹、熊、羆、朝鮮狼。無論如何，不僅本市少爺、小姐，就是全島的諸位看來，〔動物〕牠們隨著時局的進展而犧牲，實在很可憐。但這些猛獸完成了永久的使命，提供臺北帝國大學動物學及醫學部和大學病院等作為種種研究資料，並剝製保存於博物館或動物園，骨骼也成為動物研究資料。至於殺戮的方法，研究過毒殺、銃殺及其他方法，結果決定使用電氣，請電力會社協力。市方面為撫慰這些犧牲的動物，有為牠們供餐。由於猩猩是日本唯一的貴重動物，已將其獸檻加強為兩重，並設石造防彈壁予以保護；象已家畜化，很受飼養夫馴化，腳上了鐵鎖，也已設石造防彈壁，因此將予保留；而大蛇及鱷魚正冬眠中，因此也保留。⁶³

63 〈剝製で坊や嬢やのお友達に 熊や虎もお國の為に 臺北市動物園空襲に備へ猛獸處分〉，《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2月27日，夕刊版2。

這是一份臺北當局在殺戮動物園的動物前（開始的當天），公開對市民發出的通告，似有取得市民諒解的意涵，也彰顯該市動物園的動物與市民（尤其文中提到的「少爺」與「小姐」——即兒童）之間的關係；也可能當時臺北市當局擬透過這項政策說明，達到某些政治或軍事目的（詳後）。這篇報導與官方的說明，詳述臺北動物園執行「猛獸處分」的原因、經過與後續處理措施，強調是為空襲而準備，依循日本內地動物園（尤其是上野）的成例，而保留猩猩、大象、大蛇及鱷魚等動物，由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協助以電殛方式殺戮——稍早鹿兒島動物園也曾在同年處分動物，毒殺法失敗後改採電殛法。

由於臺灣的報導是執行前（及開始執行當日）發稿，這份報導所描述的被處理動物種類與使用方法，並不是完整的訊息，也無法了解遭處分的動物數目。但對於臺灣動物園這次「猛獸處分」之後的情形，1944年從北海道小樽來臺北帝大就讀獸醫的學生佳山良正留下回憶。他說他到臺灣時，由於經過「猛獸處分」，動物園中僅飼養著中小型動物與鳥類。聽說臺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獸醫學生也參與了「猛獸處分」的過程，並實地接受解剖指導，臺北市的技師與任教大學的森於菟教授也曾參加。殺戮的方法是將動物誘入舖有通電鐵板的獸籠內，再以通電長槍刺向動物的臉部，獅子及老虎都是被這樣「處分」，而熊在被電殛兩三次後仍能站立。據說學者不但解剖這些被電殛的動物，還試吃牠們。⁶⁴ 這一部分亦可參考另一位臺北帝國大學農學部研究人員劉盛烈的回憶。他在1938年從理農學部化學科畢業，留校研究（1943年兼任臺灣花王有機株式會社技師補），1945年取得博士學位。他提及猛獸被利用三千伏特高壓電殺死，死屍送至生物學科實驗，由於數目過多，就將肉分送同仁食用，劉盛烈分得熊肉，由於戰時物資缺乏，他「把它當做跟豬肉、牛肉一樣，煮熟吃了，雖然已經不記

64 佳山良正，《臺北帝大生：戦中の日々》（東京：築地書館，1995），頁 47。1943 年底鹿兒島動物園之殺戮法，轉引自網站「戦時中の動物園」：<http://ppt.cc/xLjf>，2012 年 12 月 1 日點閱，該站已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關閉。

得味道如何了，但當時的感覺確是蠻高興的」。⁶⁵

此外還有對動物作了第二次的處分，依臺北州所發的「火藥類所持許可證」，1945年3月3日時臺北市動物園另以7發銃彈（其中一發空彈，因此實為6發）槍殺園中2頭獅子。⁶⁶不過戰爭結束15年後，有獅子亡故時園方表示牠早在戰前就來到園中，可推知戰爭末期的猛獸處分範圍並非全面，至少獅子並沒有被完全「處分」。⁶⁷

戰爭結束近20年後，報端曾有一說不盡實在：1945年臺灣遭受空襲，「全部的動物均予電斃，惟恐一旦獸檻炸破，動物逃出而造成災害，以致當時遺留下來的祇僅僅是兩隻食用火雞而已」，對於實際處分時間、方式與範圍上，都有值得商榷之處。⁶⁸

雖然臺北市當局在關於猛獸處分對市民的公開聲明中，並沒有提到軍方或日本中央的明確政令，但仍出現「指示」二字，顯示臺灣動物園與日本內地動物園在決策上的指揮關係，或至少是依循日本內地的作法。有關日本帝國動物園決策的一致性，動物園間聯合組織的形成是一個因素。進入戰爭時期後，日本動物園界⁶⁹因漸感物資不足，為技術與資訊交流、飼料及動物相互調節，而於1939年5月23-24日於京都動物園開會，臺北市動

65 林忠勝編著，《劉盛烈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頁62。

66 1945年銃殺獅子之說，參見「火藥類所持許可證」第壹號，1945年1月18日臺北州核發，記載有臺北市動物園非常警備用「鹵獲（可能為來自敵軍戰利品）小銃」彈藥30發，到1945年3月3日因銃殺園中兩頭獅子而使用7發（其中1發未爆），存留23發子彈；到1945年11月29日檢查時，共存留24發（含未發彈1發），此文件藏於今臺北市動物園。試吃之說見：竹中信子，《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下》（臺北：時報文化，2009），頁332；楊登凱，〈臺灣保護動物法制之演進——探索法律對動物管制或保護之歷史〉，臺北：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97。

67 〈圓山動物園 遽喪獸中王 身隻影單久無配偶 一朝有病竟告不活〉，《聯合報》，1960年9月4日，版3。

68 〈檻柵邊朝夕相伴 三十年人情溫暖 不見馴獅人孺子長相憶 為覓飼養者猩猩更悲淒〉，《聯合報》，1975年11月10日，版3。

69 當時全日本主要動物園包括臺灣及朝鮮共17所，1所為國立（朝鮮），市立12所（臺灣在內），縣轄者1所、私立3所由電鐵會社經營。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頁158。

物園也派出技師磯崎義演與會。⁷⁰會中決定成立全國動物園協會，這是當年11月17日「日本動物園協會」（次年6月召開第一次總會時更名「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⁷¹成立的緣由。⁷²在1939年京都的全國動物園長會議中，會議紀錄提及空襲對策的猛獸處理事項，載明空襲時根本方法是加強動物寢室的耐震、耐火能力，並將猛獸檻舍偽裝迷彩化，而射殺動物則是「必要的最後手段」。紀錄中也提到臺灣特別有遭受空襲的可能，人心相對浮動。⁷³1943年8月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召開戰時最後一回總會（即第四回總會），會中日本內務省代表曾要求各園處理猛獸，之後即由上野動物園帶頭執行，各動物園接續，總計戰爭結束前，全帝國動物園共「處分」303頭「猛獸」。⁷⁴臺灣選擇在是年（1943）12月底開始執行，除依循內地動物園之例，或許也受到前一個月新竹空軍基地遭美軍大規模空襲造成的恐慌心理影響。

因此研究者指出，日本帝國關於猛獸處分政策有幾點特色：首先，即使執行方法與時間不一，但它是全帝國一致陸續執行的，在當時其他國家的動物園這是絕無僅有的現象。⁷⁵究其原因，日本主要的公共動物園都由

70 磯崎義演自1930年至1944年，在臺北市役所土木課擔任技手、吏員或技師（自1937年起）。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71 1940年6月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第一回總會在東京召開時，臺北市動物園也是19所創立會員之一，會員各派代表與會擔任協會評議員，臺北的代表是赤松稔技師。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頁160。

72 有異於日本動物園界為應對戰爭情勢而成立全國聯合性質的組織，美國的動物園與水族館經營者早在1924年就成立美國動物園與水族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Zoological Parks and Aquariums, AAZPA），後者的目的是改革傳統的動物園（即menageries）經營問題，包括規劃不當、設備不良、經濟維持方式不佳。簡而言之，美國動物園界在1920年代即思考到動物園專業經營技術的問題。參見Elizabeth Hanson, *Animal attractions: nature on display in American zoos*, pp. 31-32.

73 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頁160。臺灣最早於1938年2月23日臺北州松山及新竹州竹東首遭蘇聯航空志願隊與中國空軍機空襲，此後1943年11月25日新竹空軍基地遭美軍大轟炸，損失極重，1944年10月後美軍更開始對臺灣全面性空襲，主要針對軍需產業、軍事單位及官署或經濟活動頻繁處，但也有民宅受波及。參見：維基百科「臺北大空襲」條目，2013/1/30點閱；〈敵機空襲犧牲者のため 弔慰と救済方法決定 けふ總督府で打合せの結果〉，《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2月25日，夕刊版2。

74 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Loc283.

75 據戰前曾在北京動物園工作的夏元瑜回憶，他曾在戰爭末期奉命用氫酸鉀等毒死了園中包

市級政府經營，營運上有高度中心統一性，決策者為官僚而非動物園人員，而官僚階層又如同一條直線般層層轄制，從中央到地方有連動關係，各動物園本身的自主性相對被減低，動物專業人員僅能受命於行政人員。⁷⁶其次，關於猛獸處分政策制定者與責任歸屬問題，向來都認為是以日本陸軍為主，但其實日本內務省與東京都長官大達茂雄的角色不容忽略。內務省對動物園水族館協會的影響已如前述，即在1943年8月日本動物園水族館協會總會中要求各園處理猛獸，之後即由上野動物園帶頭執行，各動物園接續。而東京都長官部分，雖然東京都所屬的上野動物園係於1941年7月底，即接獲日本陸軍東部軍司令部獸醫部制定非常時期動物園對策的要求，而研擬提出「動物園非常處置要綱」。⁷⁷但該項措施的執行，則是在處置要綱擬定的兩年後，即1943年8月中，由大達茂雄下執行命令，透過公園課長傳遞給上野動物園。⁷⁸

值得思索的是上述報導所流露臺北動物園經營者的動物觀：動物的價值在於彰顯其在人類社會中的「永久使命」，牠們雖因戰爭情勢而被「處分」，但其犧牲被經營者認為是有意義的——能貢獻於人類的動物研究與教育，留下剝製的標本可讓牠們完成使命；而何為猛獸？何需受處分？則

括豹在內的 10 多隻猛獸，「至今內疚於心」。由於當時北京是日本占領區，屬日本帝國勢力圈，可能係執行帝國一致的猛獸處分政策，而中國境內其他動物園是否同採此政策暫存疑。夏元瑜，〈豹友〉，收於夏元瑜，《以螻蛄為師》（臺北：九歌出版社，2005），頁 85；楊登凱，〈臺灣保護動物法制之演進——探索法律對動物管制或保護之歷史〉，頁 91。

76 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Loc283.

77 「動物園非常處置要綱」中，將上野動物園所有動物依「危險度」分為四類，第一種最危險動物包括：各種熊類（如北極熊、馬來熊、日本熊、朝鮮黑熊等）、虎、豹（含黑豹）、土狼、獅子、河馬、印度象、黑猴、狒狒、大蛇等，依情勢必要時逐類處置，並列出處置時藥物原則，附上各種動物致死藥量資料，明定緊急時採用銃殺法。然而後來實際執行時，由於沒有屠殺動物的經驗，毒殺、刺殺、絞殺甚或餓死等方法併用。上野動物園在 1943 年 8 月至 9 月，1 個月內殺了 14 種 27 頭動物。東京都編集，《上野動物園百年史》，頁 165-196。

78 大達茂雄曾長期任職內務省，該省對於動物的軍用很有經驗，上野動物園的黑豹脫逃事件（1936）的震撼、英軍轟炸德國柏林動物園（1941）及他在昭南（今新加坡）對動物園的觀察，都影響到他下令執行這項猛獸處分政策。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Loc658、701。

由各動物園經營者自主斟酌判斷。臺北動物園的標準是該動物在帝國裡的稀有性與其家畜化程度。預定「處分」的「猛獸」包括獅子、虎、豹、熊、羆、朝鮮狼，這其中獅、虎、豹及朝鮮狼為肉食性動物，熊及羆為雜食性動物。不列入「處分」的動物，則包括草食性的大象，因臺北動物園認為園中大象已成為「家畜」，受到馴化——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內地動物園許多大象卻被列入戰時猛獸處分名單。以果實為主食的婆羅洲猩猩一郎，被報導的記者提起其名，並尊稱為「先生」，彰顯其在全園動物中，特別具有人類社會的可辨識性，可以說被納入了人與動物的「絆」，因其在帝國內稀有，被視為「國寶」，因此不必「處分」，僅需強固其檻舍，預備面對可能來的空襲。大蛇與鱷魚也不需處分，因正值冬眠期——但不知冬眠醒來後，動物園將如何看待牠們的身分。

關於猛獸處分政策的原因，有人懷疑空襲之說其實是動物園的藉口，認為真正的理由是戰爭時期糧食飼料不足。確實，戰時各動物園多面臨糧食問題。上野動物園在1940年1月時，就曾屠殺園中7頭山羊以餵獅、豹，⁷⁹同年10月10日林獻堂參觀該園，即曾在日記寫下：「觀動物園，獅、虎皆甚消瘦，偃臥不能行動，因年來肉甚缺乏也。」當時臺灣的圓山動物園也同樣遭逢食物困難的問題，因此也試圖控管動物的增加，如過去曾竭力歡迎各界捐贈珍禽異獸，此時因民間也受到食物荒波及，一些飼養寵物作研究或趣味者相繼對園方提出捐贈動物的申請，造成動物園的困擾，動物園因而公開表示除「珍獸奇鳥以外」，凡園內已有的動物，就不再接受捐贈。⁸⁰ 新京動物園也因為園內肉食動物缺乏食物，而撲殺關東軍的負傷軍馬作為補充。⁸¹ 但糧食不足的理由，似尚不足以完全解釋為何需由中央或

79 懷疑之說見維基百科「臺北市立動物園」條目：<http://ppt.cc/Jd!t>，2013/1/31 點閱。秋山正美，《動物園の昭和史》（東京：株式會社データハウス，1995），頁129。

80 〈動物園も御遠慮 珍獸奇鳥以外の御寄贈〉，《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月10日，夕刊版2。

81 犬塚康博之意見，轉引自三上右近先生2013年1月1日致筆者email。

首都官員作出屠殺的指示。

戰時猛獸處分政策的研究者也認為以空襲為口實並不合理，因為空襲目標多為軍事用地、經濟活躍區或官署，除1939年閃電戰時英國倫敦的例子外，極罕見動物園遭空襲之情形；而日本動物園的動物處分時間，也遠早於大規模空襲發生前。⁸²這些檢討大致適用於臺灣的情形，尤其臺北動物園並不在城中，圓山當時係屬市郊，較不是空襲目標，園方事實上可以思考用強固檻舍等方式或其他預防措施避免動物逸出傷人，這也是包括象與猩猩等決定保留的動物的一般作法。因此專家古賀忠道認為，動物園的猛獸處分政策其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一種戰爭心理策略，有意藉市民熟悉的動物被屠殺引起的心理震盪，來增強市民對空襲的警戒感，也對戰爭氣氛更敏銳，強化戰鬥情緒，同時把喪失所愛動物的仇恨歸咎給敵人。當時任東京都長官的大達茂雄曾久任內務省，嫻熟於戰爭宣傳，或許因此會採取較激烈的作法，拒絕留下東京上野動物園內的草食性動物如大象，並且不肯考量將動物疏散到郊區。為撫平市民與這些死亡動物間的情感，事後東京舉行了慰靈祭，透過公開的儀式悼念犧牲的動物。⁸³然而有關臺灣的動物園內的動物處分措施，除從時間上可推測是依循日本本土的指令外，是否有觸動市民戰爭意識的心理戰動機，本文因相關資料缺乏，無法斷定。

相較於東京官方對上野動物園猛獸處分的運用，臺灣方面除剛開始執行前，向市民發出公開聲明外，後續過程似乎較被動、低調，也因此人們留下的記憶較為有限。但是戰後的新聞媒體中，1950年代前仍偶會提及戰時為防空而以電殛方式屠殺動物的往事，並提及戰後所餘的大動物僅「獅象各一」。⁸⁴當時臺灣仍處於與中國大陸對抗的態勢下，仍有防空備戰的

82 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Loc3773.

83 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Loc3858.

84 〈禽聲獸語 圓山動物園的昨今〉，《民報》，1946年6月28日，版2；〈臺北動物園正力求充實中〉，《民報》，1946年10月5日，版3。

需求，但圓山動物園當局已不再考量猛獸處分政策，而認為堅固的鐵籠足堪信賴，因此1955年時擔任動物園技師的蔡清枝向記者說明：「關於空襲時期動物園動物安全問題，……像獅、虎、豹等的安全，該園已做好了鐵籠，非常堅固，遇有空襲，將猛獸驅入籠內，外再加粗鐵絲籠，即使獸柵被炸，猛獸也無法跑出來傷人。」⁸⁵這也代表之前來自高層的壓力消失，以屠殺動物作戰爭心理動員的政策已經完全過去。

五、結語

本文以戰爭與動物園為主軸，從戰爭的特殊背景，探討軍用動物的宣傳、動物慰靈祭和動物園的關係、戰時猛獸處分政策，可了解戰時動物在動物園內被極端軍事資源化利用的實情。戰時的動物園呈現精神動員的一面，對軍用動物的宣傳，巧妙地以動物為媒介，運用家族情感，將前線和後方都聯結在愛國的目標下。猛獸處分政策則顯示動物的犧牲如何被國家合理化，在戰時食糧有限、空襲陰影下，甚至可能成為心理戰的工具。動物慰靈祭則是透過儀式，強調動物對人類的貢獻，戰時著重對軍用動物的追悼，戰後則轉化為追思動物曾帶給人們的娛樂效果。其間對動物的愛護與毀滅同時併存，呈現相互矛盾的現象，與動物園宣稱為都市文明設施，及愛護動物宣傳與自然教育場所的功能相牴觸。

在戰爭中，動物的價值被國家重新定義，有助於戰力的動物被珍視、被繁殖，無助於戰爭者則被屠殺處理，對動物的紀念儀式，也是為強化利

85 〈圓山動物園內 花豹夫婦添丁 母老虎一直空閨獨守〉，《民聲日報》，1955年4月23日，4版。距離戰時猛獸處分不過才隔13年，圓山動物園內對戰爭時期的記憶就有嚴重的斷裂了，在1956年時，該園園長李宗富曾對記者提及戰時猛獸處分，但卻是錯誤的說法：「今年是動物園整整開園四十年紀念，這些年來從來沒有出過猛獸逃走的事情。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動物園曾遭盟機炸毀，有猛獸逃出，但是立被格斃，後來為了安全把所有的猛獸都射殺了。那是特殊情形，平時沒有過這種事。」見〈動物園南山虎嘯 馴獸師智擒麗美 放虎容易捉虎難 小販傷臂 動員二十人遊客飽受虛驚〉，《聯合報》，1956年8月11日，版3。

用的目的而舉行，因此剝削愈多，紀念儀式也舉行愈頻繁。因此可以說，動物也參加了人類的戰事，而人與動物的關係在戰爭時期也被重新改寫與形塑。

引用書目

- 《中央日報》(1950)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火藥類所持許可證〉，1945，藏於臺北動物園研考室。
《動物慰靈祭》，臺灣電影文化公司製作出版，1961，國家電影資料館影片。
〈銃砲所持許可證〉，1945，藏於臺北動物園研考室。
《臺北市統計書》
《臺灣日日新報》(1901-1943)
《聯合報》(1952-2012)
- Anthony, Lawrence & Graham Spence.
2008 *Babylon's Ark: the Incredible Wartime Rescue of the Baghdad Zoo*. NY: St. Martin's Press.
- Baratay, Eric & Elisabeth Hardouin-Fugier.
2002 *Zoo: A History of Zoological Gardens in the West*. London: Reaktion Books.
- Croke, Vicki C.
2014 *Elephant Company: The Inspiring Story of an Unlikely Hero and the Animals Who Helped Him Save Live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anson, Elizabeth.
2002 *Animal Attractions: Nature on Display in American Zoo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toh, Mayumi.
2010 *Japanese Wartime Zoo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othfels, Nigel.
2002 *Savages and Beasts: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Zoo (Animals, History, Culture)*. Baltimore;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kabelund, Aaron Herald.
2011 *Empire of Dog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エルメル フェルトカンブ(Elmer Veldkamp)

2009 〈英雄となった犬たち 軍用犬慰霊と動物供養の変容〉，收入菅豊編，
《人と動物の日本史3 動物と現代社会》，頁44-68。東京：吉川弘文館。

マルタン・モネステイエ(Martin Monstier) 著，吉田春美、花輪照子譯

1998 《図説動物兵士全書》。東京：原書房。

大丸秀士

2003 〈動物園・水族館における動物慰霊碑の設置状況〉，「第9回ヒトと動物の関係学会学術大会」。
ヒトと動物の関係学会網頁：
<http://www.hars.gr.jp/taikai/9th.taikai/9thconference.htm#gaiyou>，2011年11月10日點閱。

不著撰者

1936 〈雜報 犠牲動物慰霊祭催さる〉，《臺灣之畜産》4(12)：25。

不著撰者

1941 〈支那事變軍馬祭〉，《臺灣畜産會會報》4(12)：80。

中村生雄、三浦佑之編

2009 《人と動物の日本史IV 信仰のなかの動物たち》。東京：吉川弘文館。

今川勳

1996 《犬の現代史》。東京：現代書館。

犬塚康博

2009 〈新京動植物園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18號：15-25。

古賀忠道

1984 《私の動物誌》，收入《全集日本動物誌25》。東京：株式講談社。

竹中信子

2009 《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下》。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

《吳新榮日記》（1938-1966）。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

2005 《呂赫若日記》。臺北：印刻出版社；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1997 《發條鳥年代記 第三部刺鳥人篇》。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佳山良正

1995 《臺北帝大生：戦中の日々》。東京：築地書館。

依佐藤昌

1985 《滿洲造園史》。日本造園修景協会。

東京都編集

1982 《上野動物園百年史》（本編）、（資料編）。東京：東京都生活文化局廣報部都民資料室。

松崎圭

2009 〈近代日本の戦没軍馬祭祀〉，收入中村生雄、三浦佑之編，《人と動物の日本史4 信仰のなかの動物たち》，頁126-158。東京：吉川弘文館。

林良博

1998 〈東京大学に眠る上野動物園の宝物〉，《とうぶつと動物園》50:1（574號）3。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灌園先生日記》（1932-194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秋山正美

1995 《動物園の昭和史》。東京：株式会社データハウス。

埃里克·巴拉泰、伊麗莎白·阿杜安·菲吉耶

（Eric Baratay & Elisabeth Hardouin-Fugier）著，喬江濤譯

2007 《動物園的歷史》。臺中：好讀出版公司。

夏元瑜

2005 《以蟑螂為師》。臺北：九歌出版社。

國學院大學研究開發推進センター編

2008 《慰靈と顯彰の間 近現代日本の戦死者観をめぐって》。東京：錦正社。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解讀

2000 《水竹居主人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妍、塞夫、林海編著

2004 《軍鴿》。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越沢明

1988 《満州国の首都計画》。日本經濟評論社。

楊基振著，黃英哲、許時嘉編撰

2007 《楊基振日記》。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

楊登凱

2011 〈臺灣保護動物法制之演進——探索法律對動物管制或保護之歷史〉，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善堯

2011 〈動物與抗戰：論中國軍馬與軍鴿之整備〉，《政大史粹》21：129-156。

鄭麗榕訪問、紀錄

2011 〈陳德和先生訪問紀錄稿〉，未刊稿，2011年5月26日於陳德和先生臺北市家中。

鄭麗榕

2013 〈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戴振豐

2004 〈日治時期臺灣「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及「軍馬祭」的形成與進行（1936-1945）〉，《政大史粹》6：61-94。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No7, pp.77-112, December 2014

War and Animals:
A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Taipei Zoo in Yuan-shan

Li-jung Cheng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ing on the Taipei Zoo in Yuan-shan and its rol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investigates how animals were utilized as military resources by the Japanese empire in wartime by examining animal propaganda, the animal disposal policy, and animal memorial services.

Being militarily mobilized during the war period, the zoo became a place to promote the idea of “war moral” which the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publicize and also a means of spiritual mobilization. Animal exhibitions, protections, or memorials were all considered as patriotic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skillfully manipulated animal propaganda to reinforce the military’s personal emotions toward the empire in order to bind the front line and the rear area tightly for a patriotic purpose. Besides, with enforcing the animal disposal policy, animal sacrifice had been rationalized by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shadow of food shortage and air strikes, this policy could be even used as a tool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As for animal memorial services, animals’ contributions to human

beings were praised and emphasized through these services. During wartime, they showed the condolences for military animals.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y turned to recall happiness that animals had brought to human beings.

Meanings and values of animals were redefined by the government in wartime. Those animals which were beneficial to wars would be cherished with good cares and propagated; however, those worthless ones would be killed instead. Holding animal memorial services was in fact a way to intensify and rationalize these actions. The more animals were exploited, the more services would be held. In other words, animals participated in human warfare as well.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during wartime had been reconsidered and rewritten.

Keywords: war, Taipei Zoo in Yuan-shan, Animal disposal policy, Animal memorial service